



□ 杨春时

民粹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民粹主义是后现代化国家发生的一种反现代性思潮，它具有大众崇拜、推崇民间思想，反对精英主义等思想内涵。民粹主义也是当代中国一股重要的反现代性的社会思潮，应该对这股思潮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

一、改革开放后精英体制的形成

改革开放首先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然后是对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早在五六十年代时，就有刘少奇代表的精英社会主义路线和毛泽东主张的民粹社会主义路线的矛盾。刘少奇遵循苏联的精英社会主义模式，主张依靠党的干部、企业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则依然遵循革命时期的民粹路线，政治上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搞阶级斗争，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经济建设上搞群众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群众管理企业的“鞍钢宪法”；文化上打击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兵文艺等，最终发动反对所谓刘少奇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文革”。在“文革”中，民粹主义思想泛滥，所谓“大民主”“群众运动”“夺权”“三结合”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打倒封资修文化”等都是民粹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一实践把中国推入空前的动乱，几乎

毁灭整个社会文化。

改革开放后，恢复和重建了精英体制：第一是干部重新成为政治精英。把造反派从权力部门清除，恢复了被打倒的干部们的权力，而且把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变成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这是政治领域的精英化。第二是知识分子成为文化精英。“文革”前，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属于被改造对象；“文革”期间，又被诬蔑为“臭老九”。三中全会后的政策发生变化，承认“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待遇也相应提高，并且成为社会文化的骨主导力量。这是文化领域的精英化。第三是企业家产物经济精英。改革开放之前没有独立的企业家，国企干部与行政官员没有太多区别。经济改革首先是放权，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企业有了独立性，企业干部有了自主权，成为企业的真正主管，成为企业家，在经济领域有了发言权。另一方面，改革后民营企业合法化，民营企业也成长起来，成为合法的公民，并且具有了相应的政治地位，这意味着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是经济领域的精英化。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上述这三种力量实际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中坚，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型。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与民粹

主义所有的交集，如工农干部为主体，而现在的社会则明确的是精英体制，由社会精英主导。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结构是分层次的，精英阶层主导，社会才有秩序，才有发展，而民粹化的社会必然产生混乱和停滞。精英阶层主导，但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而且互相之间可以流动。比如通过上大学获得知识，可以向上流动，进入政界或者进入经济界当企业家，也可以当学者。合理的社会具有阶层间流动性，如奥巴马的父母是底层社会的黑人，他却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精英，成为总统。

在中国精英化的社会中，执政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江泽民主政的年代有一个提法，叫“把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建国前，国民党是执政党，它依靠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农村绅士这样一些精英，很多大知识分子如胡适等都被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党与执政党不同，他依靠的是社会底层、边缘的力量，发动他们造反、夺取政权。共产党最初的领导阶层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明等大知识分子，后来都被淘汰掉，掌权的换成了毛泽东那样的出自民间的小知识分子。为什么高知阶层不能当革命的领导？

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革命需要依靠穷人特别是贫苦农民，要熟悉农民，很大程度上要接受他们的观念，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因此，革命意识形态里就有了民粹主义的基因，如大众崇拜，对知识分子的贬低，等等。陈独秀、李大钊在书斋里，他怎么能了解农民？革命党要依靠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这些社会边缘的人，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利益，他们得到了土地，甚至还可以跻身领导阶层。当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很好，文化程度较高，但出于理想主义，也参加了革命，但革命的主体还是这些底层穷人。革命把社会秩序打乱，但精英阶层最初大部分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后来国民党搞得太糟了，腐败无能，他们失望了，转而倒向共产党。共产革命消灭了传统社会的精英。中国农村是家族体制，有族长、族规，是士绅统治。土改后，农村士绅被打倒了、杀了，穷人掌权了。城市里的精英，一部分跟着国民党跑了，留下的民族资本家，经过公私合营也失去了资产和社会地位；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向工农兵学习，从文化精英位置跌落，“文革”中更被打成“臭老九”。但建国后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客观要求是依靠新的精英，不能总革命造反，这样社会不稳定，也不能发展生产力了。俗话说“当家不闹事”，执政党还革谁的命？刘少奇就主张把精英体制建立起来，依靠企业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说这样就官僚化了，还是要依靠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文革”是民粹社会主义的实践，干部、知识分子、企业家都被打倒，造反派上台。在政治上搞群众专政，造反派夺权，三结合等；在经济上搞绝对平均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文化上搞打倒封资修文化，搞工农兵文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等，使中国社会全面崩溃。“文革”后，中共吸取历史教训，转变执政理念，提出“变革命党为执政党”。执政党要依靠谁？当然是社会精英。从历史上看，农民革命胜利以后，维持政权也要依靠那些儒家知识分子，不能依靠造反农民。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他还是依靠农民造反，不用知识分子。结果农民意识膨胀，进了北京城，贪图享乐，几十天就完了。现代化建设还是要依靠精英。政治精英，就是党政干部；经济精英，就是企业家，包括国营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文化精英，就是上层知识分子。

中共领导集团在90年代以后，已经意识到地位的改变，所以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有人认为三个代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没有什么新意。我认为不对，这是执政理念的转变。中共意识到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地位变了，依靠的社会阶层变了，这才是“三个代表”的真义。首先看第一个代表，“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指由阶级党变成了全民党，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革命成功以后，阶级消灭了，但毛泽东认为阶级敌人还在，反动思想还在，所以就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苏联建立以后，他们的党章就改了，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而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了。当时我们说全民党是修正主义，搞反修斗争。现在中共顺应历史潮流，把党章修改为“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就是承认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代表穷人的阶级党，变成了全民党。所谓先锋队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更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范畴，这就是

说要依靠哪个社会阶层来管理国家，于是就提出了另外两个代表。第二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是说要依靠企业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谁？农民是旧生产力的代表，工人作为体力劳动者也不具有现代知识和管理能力，企业管理者才具有现代知识和管理能力，直接促进生存力的发展。随之而来政策发生变化，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而且承认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允许这些人进入人大、政协，给了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依靠企业家。第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建设先进文化靠谁？工农兵文化层次不高，要靠知识分子。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再搞工农兵改造知识分子、学生斗教授，怎么能行得通？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政治精英主要是党的干部，也有非党干部。总之，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精英体制，并且在理念上得到了确认。

二、民粹主义是对精英体制的反动

民粹主义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动，但精英体制并不必然带来民粹主义的泛滥。为什么民粹主义在中国会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总起来说，现在的精英体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精英阶层的腐化、权贵化，造成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对立，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形成。市场经济意味着利益多元化，社会阶层开始分化。以前阶层划分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制度性的划分。首先是农民、城市居民的划分，这是经济身份的划分。农民不吃商品粮，不可以进城当工人，没有社会保障。其次是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划分，这是政

治身份的划分，干部是管理者，有特权；群众是被管理者，缺乏政治权利。市场经济以后，由于民营企业的出现，新的阶层分化就出来了，就是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的出现，也出现了贫民阶层。社会分层就会有社会矛盾，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上层要求自由多一些，底层要求平等多一些。底层经济地位低，有民粹情绪，这是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当下中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改革中受到损害的那些阶层，比如下岗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等。在改制过程中，下岗工人群体利益受损，买断工龄，社会保障很差，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政府官员、老板企业家，还有替政府说话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利益剥夺了。他们往往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那个时代平等、生活有保障。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多是利益分割问题。比如征地，是政府行为，没有市场定价，而政府收入多靠土地财政，对农民可能不公。农民不满就强征，就发生群体性事件，产生官民冲突。中国还有个特殊的情况，由于城乡分割，产生所谓农民工。他们工作在城市，但身份还是农民，没有城市户口，买房、孩子上学都被限制。这些人有怨言，有怒气，认为社会不平等，他们没有出路。这其实是改革过程中一些失误、改革不彻底，特别是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还有许多大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漂在城市，没有门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工资低，买不起房，结不起婚，产生极端情绪，容易接受民粹思潮。中国经济改革走在前面，但有些问题仅仅经济改革是解决不了的。比如权力不受制约，腐败现象惊人，贫富悬殊，这很容易让底层产生民粹主义情绪。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世界上也是

比较严重的。基尼系数超过 4.0 就是不合理了，超过 4.5 就很严重，我们很多年前就超过 4.5 了，这意味着社会矛盾很尖锐。网上的、民间的民粹情绪非常突出，非常暴戾。以“杨佳事件”为例，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无处说理，值得同情；但他报复社会，大开杀戒，暴戾残忍，枪毙合理合法，但网络上却一面倒地为他喊冤，甚至还鼓噪向他学习，把他当作英雄，这种情绪泛滥，说明社会矛盾很尖锐，民粹主义很猖獗，这就很可怕了。

民粹主义的泛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左”的意识形态没有彻底清算。“文革”以后，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曾经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但不够彻底。民粹主义不仅在上层有残留，在底层影响也很大。改革开放后，就有一部分民众头脑中的极“左”思想流毒没有肃清，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把“文革”前甚至“文革”想象得很好，平等、没有腐败，对改革有抵触，甚至认为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接受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理论来自国外“左”倾思潮，它对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影响巨大。现在知识界国际化了，过去是面向苏联，接受苏联理论，现在是面向西方，接受西方理论。西方的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大都是“左”倾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持批判立场，把“文革”想象成人民革命。这些思想传播给了留学、访学的中国学生、学者，带回国内，传播开来，形成“新左”思潮。“新左”思潮在青年学者中很有市场，讲自由主义，在西方没发言权，不新鲜，现在讲新左理论就很新鲜，就有话语权，于是他们就宣扬改革开放是西方化，“文革”是人民革命，等等。学生们年轻，本来对现实不满，就容易接受这些

经过包装的新左理论。这样一来，民粹主义在知识界就有很大影响。

再有，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未能与民粹主义切割。执政党跟革命党有很大不同，依靠的社会力量不同，意识形态也有不同，却又不能大张旗鼓地去批判民粹主义。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革命意识形态有传承关系，而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就包藏有民粹主义因素，因此难以切割。中国改革开放有个特殊现象，不是理论先行，而是少说多做，甚至不说先做。我们看邓小平的“三论”：“猫论”，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姓社姓资，看实际效果。“摸论”，摸着石头过河，不要理论指导，实践中摸索。“不争论”，非意识形态化，专注实际工作。这些策略应该说符合中国国情，使改革绕过了意识形态的浅滩暗礁。这种策略取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代价。由于没有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没有与民粹主义切割，留下了思想上的隐患。实际上也不是没有争论，对自由主义的打击力度很大，但对极左思潮、对民粹主义却不愿或不敢批判。这就导致极左势力和民粹思潮极为猖狂，左派网站公开批邓，反对改革开放，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翻案。

精英阶层的腐败堕落也助长了民粹主义思潮。精英阶层占据主导地位，要在道德上做出表率，民粹主义才没有市场。官员要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你信任，你的统治才有效。你不亲民，贪污腐败，你就没有公信力，老百姓就会认为无官不贪。企业家要有功德心，有社会责任心，洁身自好，民众才会信服你。但中国企业家的形象很差，很多国企老总高薪、挥霍、贪污，而民营企业家不走正道，官商勾结、花天酒地包二奶。老百姓就仇富，认为富皆不仁。过去知识分子一直都清

高，市场经济一来，也有腐化堕落，如许多医生收红包；一些中小学教师靠补课收学生的钱；有的大学教授也为了名利，干了很多不名誉、不道德的事；有些专家丧失良知，为不法商人说话，为政府遮丑。总之，知识精英形象很坏，被网民称为“砖家”“叫兽”。这当然以偏概全，但确实存在问题，助长了民粹主义。精英腐败堕落，民众自然鄙弃他们，认为自己比精英高尚、道德。

网络传媒的兴起，助长了民粹主义思潮，成为其主要的传播方式。传统媒体是由知识分子主导，有发言权的是官员、学者等精英，而一般底层人民没有发言权。但网络媒体是底层民众的文化载体，什么人都有发言权，天然的就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在传统媒体上，知识分子发言要有理性，你不能胡说八道，你不能骂人。大众是网络文化的主体，他们没有什么理论支持，也没用理性制约，要表达不满，要有一个发泄途径，因此网络意见大都很极端、语言都很暴力，一争论就骂人。网络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很大距离甚至对立。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也是没有权威、没有市场的，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学者一般不会到网上说话，学者的话网民也不听，甚至成为嘲弄对象。网络意见领袖是“微博大v”、网络明星之类，他们知识程度也不高，但因其民粹思想情绪而受到民间认可，能够左右网络。不能说网上言论都错，网民提出的问题很多是真实的，但他们声音大都带有偏激性、非理性、狂欢性，搞语言暴力。

底层民众的民粹情绪不能放纵，更不能错误地利用。民粹主义是潘多拉魔盒，你一打开就控制不了。比如钓鱼岛事件，民间游行，民粹主义出来了，砸车，烧日企，口号偏激极端。在极端化的民族情绪后

面其实潜藏着民粹主义，是对国内现实的不满，是反社会的行为。但是不能说网络文化是完全负面的，它有其存在的理由。网络作为民间媒体是个安全阀，社会出现问题时，让民众有途径发泄，不能一直憋着，否则就会变成暴力行为。因此我不主张封网，也不主张网络媒体国有化。要根本上消除民粹主义，还要深化改革，改造社会，铲除民粹主义的土壤。

三、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和危害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左”的思潮，借助“左”的理论表达民粹情绪。但民粹是一种底层民众的情绪表达，因此右派中也有受民粹主义影响者，他们把民主政治民粹化，只讲多数人的意志，不讲个体权利、保护少数，网络上甚至有人对对手叫嚣“民主后杀你全家”。民粹主义危害性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民粹主义左派反对市场经济，主张恢复计划经济。民粹主义夸大市场经济的缺陷，甚至把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产生的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认为是贫富悬殊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他们美化计划经济，鼓吹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主张消灭民营企业，恢复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把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

第二是主张“大民主”。他们反对民主化，也反对当前的精英政治，而主张“文革”的“大民主”即所谓“人民民主”。所谓“大民主”不是民主，而是民众暴力，它没有法律保障，主张暴力夺权。而且所谓“大民主”实际上也是受操纵的，不允许反对意见的存在，没有自由的讨论，是极“左”思潮和野心家操纵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者鼓吹

再来一场“文革”，打倒“资改派”，企图把中国再次推入腥风血雨中去。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表现是反精英主义。所谓“仇官、仇富、仇精英”，仇视官员、富人和学者。左派和右派的一些人都有这种民粹情绪。政府说什么，他们肯定不相信；富人倒霉了，他们叫好；知识分子说的，都是假的。网络上一些极端的青年人，认为精英都不好，要打倒这些人，让底层民众主导社会。不管社会精英有多少问题，不能一味排斥，无论如何精英应当是社会的中坚，打倒了精英社会就垮掉了。

民粹主义的第四个表现是强人崇拜。民粹主义虽然崇拜大众，但大众只是一团散沙，要有强人来统领，因此民粹主义必然导致独裁政治，比如拉美一些民粹政权就是如此。这种强人崇拜，很危险，很可能导致法西斯独裁。民粹主义在历史上很不光彩，曾经助长法西斯主义。希特勒怎么上台的？由于国际范围的经济危机，巨额的战争赔偿等原因，使德国当时政治、经济上都遭遇困境，导致工人、农民、下层知识分子的不满。希特勒就煽动、利用这些人的民粹情绪，声称国家是被官僚、大资本家、犹太人搞坏的，要打倒这批人，搞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底层的工人、市民、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于是希特勒靠民意上台，搞法西斯独裁。日本也有这样的情况，少壮派军人声称代表底层民众，反对官僚和大资本家统治，结果上台后扩大侵略。“文革”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民粹主义煽动，说官僚腐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要紧跟伟大领袖造反。

民粹主义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危险之一。首先，它阻碍改革深化，导致经济和政治倒退，葬送改革成果。改革进入深水区，阻碍改革的

因素很多，如既得利益集团、极左思想、保守主义等，民粹主义也反对改革，把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改革的恶果。因此，要建立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要建立精英主导的民主政治体制，都会引起民粹主义的反弹，使改革难以深化。

其次，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稳定。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很多，最好的办法是深化改革，完善法制，建立社会保障，消解社会矛盾。民粹主义不是主张用对话、沟通、改革解决，而是要走极端，煽动贫富对立、官民对立、民众与知识阶层对立，主张颠覆一切现代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穷人说了算”的乌托邦社会，这是对社

会稳定的很大的威胁。

更有甚者，他们鼓吹二次“文革”，企图把中国拉向万丈深渊。民粹主义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更具有危害性，会被像薄熙来那样的野心家利用，祸国殃民，甚至把中国引向法西斯化。薄熙来贪污腐败受到制裁，但他的政治路线更危险。他以民粹主义煽动底层群众，利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社会矛盾，炒作唱红打黑，引起对改革开放前的旧时代的怀念，形成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树立其民意领袖的形象，以实现其政治野心。所谓重庆模式就是反对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模式。如果真的极“左”派上来，再来一次“文革”，中国就万劫不复了。这种危险不能说不存在，必须在思想上消除隐患，做好预防。

四、深化改革，消解民粹主义思潮

要在根本上要铲除民粹主义的社会土壤，唯一的途径是深化改革。第一，真正地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把市场经济规范化，打破利益集团的控制，消除贫富悬殊现象，建设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现在的社

会是金字塔形，富人极少，占有很多财富，而穷人占绝大多数，中产阶层很小。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不稳定的，搞民主就会导致民粹政治。如泰国，多数人是穷人，他们控制选票，结果产生民粹主义的政府，它偏向底层大众，侵犯中产阶层和上层利益，导致反弹，结果社会动荡，国家发展不了，底层反而最受损害。合理的社会结构应当是橄榄型的，富人和穷人的都是少数，多数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有政治参与的意愿，有民主的意识，要求稳定，是民主社会的主体。我们中产阶级的比例占人口比例很低，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般认为中产阶级最少要40%，才能有社会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因此要深化改革，让多数人占有财富，扩大中产阶层，使其成为社会的中坚。

第二，要克服社会阶层固化倾向。底层民众接受民粹主义，是因为在当下社会中，由于政治腐败、市场经济不规范导致的阶层固化，他们没有出路，没有发展，没有希望。要让社会阶层流动，避免由于阶层固化使底层民众产生绝望感，从而走向民粹主义。特别是要解决由于官僚制度造成的政治精英权贵化，以及政治权力与资本结合造成的经济精英权贵化，也要防止上层知识分子与资本、权贵结合造成的文化精英依附权贵的倾向。这一切都要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清明、经济规范，才能形成一个阶层非固化、流动性的社会，这是避免民粹主义的泛滥的根本保证。

第三，要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民粹主义。主流的意识形态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批判的比较坚决，但对“左”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批判比较弱，对“文革”的清算甚至成为禁区。“文革”错误不仅

是打倒老干部的问题，不仅是毛的错误问题，要害是“左”的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对民粹主义，你不批判它，甚至还包庇、纵容它，民粹主义就借尸还魂，号召民众，祸乱社会。要让民众明白，社会是个共同体，你把精英打倒了，穷人只会更穷。出路不是打倒精英，而是改造社会。可以说，将来的社会动乱之源就是民粹主义。只有彻底清除极“左”思潮，批判民粹主义，才能拆除这个定时炸弹的引信。

第四，要使精英阶层自律。精英阶层的腐化堕落，导致民众的反感。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社会规范，提高精英自身的素质，树立社会中坚的威信。政界、企业界、知识界都要自律，建立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改变形象，才能改变底层民众“仇官、仇富、仇精英”的心理，才能让民粹主义没有土壤。

第五，以积极、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化。首先要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下去只会加重社会矛盾，给民粹主义以可乘之机。但改革不能激进化，激进的改革主张一步到位，但社会条件不成熟，也会导致民粹政治，造成社会失序。应该通过加强法治、逐步的扩大民主，最终完成现代社会的建设。西方也是先实行有限民主，经过一两百年逐步才实现全民民主：早期是要求有一定财产、交税达到一定额度的男性才有选举权。后来中产阶级增多、扩大了，于是所有的男性都有了选举权。再后来妇女参与社会生活，有知识了、有工作了，也才有选举权。中国也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扩大中产阶层，逐步健全法制，逐步扩大民主。这段路程很长，不能急切，欲速则不达。通过渐进的民主建设，消除激进主义的土壤，民粹主义才没有机会得逞。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